

JIEMA SANGUO

解码三国

从这里，读懂三国

殷坤 著

JIEMA SANGUO

解碼 三國

从这里，读懂三国
殷 坤 著

长江出版传媒
©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码三国/殷坤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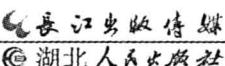
ISBN 978 - 7 - 216 - 07164 - 2

I. 解…
II. 殷…
III. 中国历史—研究—三国时代
IV. K23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6545 号

解码三国

殷 坤 著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版次: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字数:283 千字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7164 - 2

印张:17.25
插页:2
印次: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目录

引言 1

第一章 东汉的崩溃 4

公元 189 年八月的一天，东汉皇帝刘辩在一群宦官的簇拥下逃到了黄河边上。面对滔滔的黄河水，宦官们绝望地说：“臣等殄灭，天下乱矣。惟陛下自爱！”这话一针见血，东汉帝国的国运已成覆水之势，崩溃已无可挽回。曾经强盛一时的帝国为何会陷入绝境？曾经至高无上的皇帝为何会沦落到如此田地？一切都是从那场撕裂帝国心脏的大祸说起。

第二章 皇帝问题 24

面对气势汹汹的董卓，袁绍引刀横揖：“天下健者，岂惟董公？”不久便举起反董大旗。面对手握重兵的袁绍、韩馥，曹操豪气冲天：“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从此便与他们分道扬镳。面对自己的兄弟袁绍，袁术义正辞严：“懔懔赤心，志在灭卓，不识其他。”于是，兄弟反目。面对雄踞一方的袁术，陈珪毫不示弱：“欲吾营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拒不归顺。是什么问题让他们彻底决裂甚至兵戎相见？面对这个问题，他们又为何有各自截然不同的答案？

第三章 曹操与袁绍 42

他们曾经一起飞鹰走狗，一起并肩战斗，一起成为那个年代

的绝对强者。当他们龙骧虎步、仗剑而行时，无人敢与之争锋。可是，正因如此，他们的友谊最终走到了尽头。一山不容二虎，曾经的好友终于反目。武无第二，于是他们中注定有一个以悲剧收场。更悲剧的是，成王败寇的历史法则让他们在后人的眼中，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英雄，一个草包。

第四章 双雄争霸 68

官渡，一个如今在地图上已找不到踪迹的小小渡口，在公元200年时却是整个中国的焦点。在这里，最有资格号令天下的两位枭雄展开了一场巅峰对决。这不是一场轻松的比拼，而是一场站在悬崖边上的决斗。生与死，胜与负，就在那一念之间。

第五章 汉室宗亲 86

在东汉帝国里，有这样一支势力。他们或许不忠于皇帝，但绝对忠于汉朝。他们绝不允许别人篡汉，但心里却也未必不打皇位的主意。他们是汉室宗亲，刘姓皇族。在他们之中，有一个人看上去没有多大本事，但却常被人看作英雄；从未打过什么像样的胜仗，却最终与曹操分庭抗礼。他的名字叫刘备。

第六章 三顾茅庐 98

三顾茅庐，这是个在中国无人不知的传奇故事，这是无数中国文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待遇。可是，这是真实的吗？诸葛亮为何在古隆中的茅庐里单单等候着刘备的光临？刘备去过草庐几次，又见过诸葛亮几次？让我们现在就揭开历史的迷雾吧。

第七章 江东基业 114

江东是一个几乎永远与偏安相联系的名词。从东晋到南明，几乎每当外族入侵，汉人的朝廷总会依靠长江天险在江东苟延残喘一阵。但偏安这个词却不适用于孙氏父子和他们的东吴

帝国。从孙坚到孙策到孙权，他们以勃勃雄心，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江东基业。

第八章 赤壁那点儿事 130

除了赤壁，在中国还没有哪个地方会仅仅因一场战争而天下闻名。从“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这一战凝聚着太多英雄美人的诗情画意。从草船借箭到蒋干盗书，后世文人为这一战杜撰了太多不可思议的奇谋妙计。战争真的如此吗？

第九章 天下三分 148

诸葛亮未出茅庐之前就已预料到将出现魏蜀吴鼎足而立的局面。可是，套用一句经典的台词，他只猜到了开头，没有猜到结尾。事实上，从天下三分开始，形势的发展轨迹就脱离了《隆中对》的规划。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从何时起出了问题？这要从分割荆州说起。

第十章 裂开的帝国 167

曹操是否有心篡汉？没有人能够给出准确的答案。曹操可能没有决定篡或不篡，但权力所能带来的无尽利益让他已经决定不但绝不放弃权力，而且要更大的权力。没有人知道曹操篡或不篡，但所有人都知道篡位需要权力。希望他篡位的人要扩大他的权力，不希望他篡位的人要限制他的权力。于是，帝国裂开了，一场暗战上演了。

第十一章 诸葛亮治蜀 183

如果说秦始皇是千古一帝，那么诸葛亮便是千古一相。从姜子牙、萧何到张居正、曾国藩，在中国古代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宰相有诸葛亮那样的声望。可是，让很多现代人不解的是，六出祁山而无功的诸葛亮为何能有如此的江湖地位？在益州这个不大的舞台上，短短十余年的时间，他以何种绚丽的演出让后人将

其奉为神明？

第十二章 最后的汉政权 205

即使到了诸葛亮去世的二十多年以后，蜀汉依然是一个治理得相当好的国家。甚至灭蜀的主将邓艾最初都认定伐蜀无利可图，不主张对蜀汉发动战争。可是，就在短短几个月后，蜀汉帝国轰然倒地了。一切来得那么突然，似乎正如杜甫的诗中所言：“运移汉祚终难复”。我们要问：蜀汉的国运为何突然终止了呢？症结何在呢？

第十三章 曹魏的掘墓人 226

公元 263 年，曹魏灭掉了蜀汉。可是，此时的曹魏早已不姓曹了。早在十几年前，司马氏就已经掌握了曹魏帝国的大权。是谁埋葬了曹操付出了一生心血缔造的强大帝国？在曹魏帝国强大的外表之下，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深重危机？

第十四章 士族的东吴 243

东吴是一个曾经野心勃勃、血性十足的政权。三伐黄祖，孙权为父报仇屠江夏；赤壁之战，周瑜主动迎击破曹操；白衣渡江，吕蒙奇袭荆州擒关羽；夷陵之战，陆逊指挥若定烧连营。可是，在此之后，坐拥荆、扬二州的他们却只能限江自保，在内乱的泥淖中无法自拔，苟延残喘。这是为什么？

第十五章 分合有因 263

随着西晋吞吴，三国时代划上了句号。然而，三家归晋就是三国的结局吗？曹、刘、孙三家争来争去的结果只是为司马氏作嫁衣吗？三国纷争的历史根源究竟何在？其最终结果又是什么呢？

后记 271

引　　言

如果问整个中国历史中哪一个时期最为老百姓所熟知，我想回答多半会是三国。且不说别的，单就历史人物而言，有几个中国人不知道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

然而，正如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中说的那样：“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这是一些引人入胜的故事，这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正史记录，野史传说，戏剧编排，小说演义。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点，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众说纷纭，成败得失疑窦丛生。”太多谈论三国的人分不清史实与故事。有些人甚至愿意把野史传说或者艺术作品当做史实并大加点评。

这样的“历史”除了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之外，对于现代人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相反还有极坏的影响。比如野史对奇兵妙计的推崇让人们崇尚权谋，让人们习惯于投机取巧，而非认认真真地朝着自己的理想去奋斗。

所以，我们必须大声疾呼：历史不是这样！我们必须还原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让那些被艺术作品神化了的、丑化了的、加工了的、扭曲了的、移花接木了的、张冠李戴了的人和事恢复其原貌。

当然，这里所谓的原貌，恐怕并不就一定真是事实真相。我们毕竟不能找到亲历者，也不可能在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架设摄影机、录音机。在某位大发明家发明时间机器之前，我们只好依靠历史记载，依靠史学家们的考证、考古学家们的发掘，以及逻辑推理。

还原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只是本书所要达到的第一个目标，但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我们要找到各种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探索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解释历史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那样发展。这是更深的一个层次。

很多历史评论者也在做这样的工作。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分析历史为什么会这样时，往往陷入片面化和简单化的窠臼之中。

比如,一种常犯的错误是简单地将历史人物划分为明智和愚蠢。柏杨先生在其对《资治通鉴》的评论中就常常斥责他们“唯利是图”、“目光短浅”甚至“白痴”(在评价平原君赵胜主张接受上党而引发长平之战时)、“野狗”(在评价白起坑杀长平降卒时)。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中也说袁绍“政治上短见,军事上弱智,组织上低能”,说他和刘表都是“漂亮的草包”。

这种评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批评别人,在事后放放马后炮总是很容易的事情。就好比我们看足球,都能骂球员臭脚,但你自己上去踢两脚就知道自己的脚有多臭。或者好比买股票,看着过去的走势图说应该在这里买、那里卖就赚大钱了,可实际操作起来,恐怕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他们所无法解释的是,既然这些失败者如此愚蠢、无知,为什么居然能够身居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位置?袁绍,一个“草包”,如何能够雄霸四州打得曹操几乎不能支持?刘表,另一个“草包”,如何能够单枪匹马控制整个荆州?

单纯地将历史的曲折变化归因于个人的贤愚忠奸是肤浅的。俗语云:“利令智昏。”又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就说明人往往会因为涉及自身的利益而难于作出正确决断。而另一句俗语“屁股决定脑袋”则说明了所处的位置(在组织中的位置、处于哪个政治集团等)对于决策的影响。此外还有物质条件、社会制度以及文化的影响。举例而言,白起难道不知“杀降不祥”的道理?但是,在以敌人首级为军功依据的秦国军功爵位制度面前,面对手下数以十万计要以这些战俘的人头去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下属。你若是白起,怎么办?在冷兵器条件下,释放战俘,这四十万人回去每人拿起根木棒就又是一支虎狼之师;不放,要用多少人才能管得住,要用多少粮食才能养得起?你若是白起,怎么办?

另一种常犯的错误是将历史人物简单地划分为对立的派别,并将政治派别与人物个体等量齐观。集团 A 与集团 B 对立,于是集团 A 中的人就一定与集团 B 中的人对立。或者反过来,反对集团 A 中的人物,就是反对集团 A;支持集团 A 中的人物就是支持集团 A。这是多么大的逻辑错误!更让人扼腕的是,有些分析者以历史人物的家族出身来划分界线。

哪里有这么简单的事?

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固然对其政治立场有巨大影响,但是家庭出身并不能决定其政治立场。如果认定一个人的政治立场真那么容易,从事政治活动也就太轻松了。要知道,政治斗争中最难的事情就是分清敌、我、友三个方面。

一旦敌、我、友三方面分得清清楚楚了，傻子都知道拉拢友方，打击敌人。举例而言，孙权集团与刘备集团本是同盟，但当关羽北伐襄阳之时，孙权却突然在背后动了刀子。再比如，许攸原本是袁绍的谋士，但在官渡之战时却突然给了袁绍致命一击。战争中的敌、我、友三方尚且难以区分，在看不见刀剑的朝堂之上，谁支持谁、谁反对谁就更加难以琢磨了。君主在歌功颂德之声中，如何能够分辨哪个是真心，哪个是假意？

还有人习惯以历史资料上的只言片语作为依据，界定历史人物。比如陈寅恪先生就依据《晋书·宣帝纪》中的“博学洽闻，服膺儒教”一句话便认定司马家族是儒家，全不顾他们何曾做到孔子所言的“臣事君以忠”。

其实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历史事件也是复杂的。历史正因其复杂，才更加迷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历史的迷雾，去解码这段引人入胜的历史吧。

第一章 东汉的崩溃

一、党锢之祸

讲述三国的作品往往这样开头：“东汉末年，群雄并起……”

这是有道理的。虽说三国是指曹魏、蜀汉和东吴。但三国时代却绝不能以这三个国家的出现来界定。否则，像周瑜、关羽、袁绍，甚至曹操这些人就都算不得三国人物，而只能算东汉人物了。所以，一般而言，三国时代是指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这段时间。也就是说，从东汉末到西晋初都是三国。

与其他作品一样，我们也要从东汉末年讲起。三国兴起于东汉解体的过程之中。东汉之所以会解体，关键在于其内部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先来看东汉的政权结构。

政权结构，即各政治势力在国家中的地位。中国历史上总共有八大政治势力。一是皇帝本人。二是皇族，他们是皇帝的血亲。三是皇帝的姻亲——外戚(还包括皇后、皇妃本人)。四是皇帝的奴仆——宦官集团。五是知识分子，即士人集团。六是以职业军人为主的军功集团。七是地方豪强。八是平民百姓。中国历代政治风云，都是这八支势力的相互博弈、较量。

东汉帝国在建立之初，为四个层次。顶层是皇帝。皇帝旁边是军功集团和皇族、外戚，他们虽然高贵但没有实权。皇帝的下面，是士人集团构成的官僚体系，这是政权的中坚力量。在士人集团的下面，是以不断被儒家思想所濡染的地方豪族大地主。以上三层，构成了东汉的国家机器。他们统治着最底层的平民百姓。

到东汉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皇帝太小，所以皇帝身边的外戚占据了政权的制高点。皇帝太小，是整个问题的起因。皇帝长大之后必然会和掌权的外戚发生冲突。怎么办？得找个帮手。找谁呢？俗话说，在家

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作为皇帝，父母是指望不上了。老爹肯定死掉了，老妈即使没死也是外戚的核心成员和后盾。至于朋友，整天在宫里的皇帝只能结识宦官。于是，皇帝和宦官结合起来对付外戚。当外戚被打倒之后，宦官又得势了。

同时，皇帝长大了，也该结婚了。一结婚，新的外戚又产生了。这个时候，如果长大了的皇帝一直手握大权也便罢了。没料到，东汉后期的皇帝都是短命鬼。几个曾经实际掌权的皇帝：和帝，终年27；安帝，终年32；顺帝，终年30；桓帝，终年35；灵帝，终年33。于是，东汉政权的顶层变成了皇帝、宦官、外戚轮流掌权。

这种结构很糟糕。外戚与宦官是八大政治势力中最无能、最腐朽的两个。他们的政治资本与治国能力无关，全凭裙带关系，所以无能。他们不是帝国的所有者，帝国的未来与他们无关，所以极度贪婪，不顾后果。这两大势力掌权，必然拼命掠夺下层的利益。

而他们的直接下层，正是士人集团。于是，外戚、宦官、士人集团，这三支政治势力展开了激烈地斗争。这场斗争的巅峰就是著名的党锢之祸。

当时，桓帝凭借宦官的帮忙除掉了不可一世的梁氏外戚集团。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及小黄门左悺、唐衡，因参与谋诛梁冀有功，五人同日封侯，人称“五侯”。史书记载：“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大臣陈蕃在给桓帝的上疏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当时“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

在这种情况下，士人集团分裂为两个派别。一部分人主动抛弃了东汉政权。他们拒绝出来做官，消极避世。以杨秉、陈蕃、李膺和广大太学生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士人采取积极抗争的态度。他们同情人民的疾苦，担忧政局不稳，愤怒揭露并打击宦官集团。

他们以清流自命，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视为浊流。他们不断向皇帝上书，揭露宦官擅权的弊端与罪恶，对他们加以弹劾。有的时候，还直接利用职权进行打压。

杨秉、陈蕃、李膺等多次搬出“高祖之约”和汉家“旧典”中关于不能让宦官当权的条款苦苦劝谏，希望桓帝“遵用旧章，退贪财，塞灾谤”。杨秉揭露专权的宦官“猥受过宠，执政操权。其阿谀取容者，则因公褒举，以报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伤，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拟国家”。士人们以太学为抨击宦官的舆论阵地，议论朝政，斥责宦官。

士人们的努力多少得到了一些回报。比如太尉杨秉劾奏益州刺史侯参的暴虐罪行,侯参在押往京都途中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劾其兄大宦官侯览,结果桓帝只好免去侯览的官职。再如,司隶校尉韩縯告发“五侯”之一的左悊和他的哥哥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结果左悊、左称都畏罪自杀。李膺担任司隶校尉时,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县令,贪残无道,甚至杀害孕妇。李膺亲自带着从吏到张让宅中搜捕张朔,交付洛阳狱,取得供词后立即处决。一时间宦官们甚至不敢再出宫门。

面对士人集团的攻势,宦官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他们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这个攻击打中了皇帝的要害。皇帝最怕的就是大臣们结党反对自己,于是桓帝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下令逮捕李膺、杜密、陈寔等二百多人。宦官集团大事网罗,一时间“使者四出,相望于道”,甚至不惜“悬金购募”。太尉陈蕃由于拒绝签署捕捉党人的命令,并极力劝谏,也遭受到宦官集团的强烈攻击而被罢官。

第二年,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桓帝不得已释放党人,但是仍然对他们实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处罚。

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从这一次激烈地交锋中,宦官背后有皇帝,士人集团的后面是地方豪强,双方基本上是势均力敌。

第一次党锢之祸,并未完全打垮士人集团。很快,士人集团就又东山再起了。这一次,他们还得到了另一支强大政治势力外戚的支援。当时,桓帝死了。他的皇后窦氏成了皇太后。窦太后的父亲窦武以大将军的身份辅政,大权在握。窦武本人虽是外戚,但饱读诗书,偏向士人。在他的支持之下,原先被打击、禁锢的党人又重新复职。外戚和士人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五月,窦武等人以日食为借口,请求窦太后诛除宦官。可是,窦太后犹豫了。结果,这一年的八月,宦官们利用他们能够控制皇帝、皇太后的优势,发动政变。一场大战下来,窦武等人失败被杀。宦官们立即发动反攻倒算,兴起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侯览指使人奏告官僚李膺、杜密等人“皆为钩党”,结果所有被告都被捕杀,妻儿都被流放边疆,亲戚朋友也都被剥夺政治权利。紧接着,宦官又大肆株连。一个牵连一个,一时之间,所有的士

人基本上都被牵连进去了。史称：“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这还不算完，有些人就借着这个机会陷害政敌，凡是和自己作对的，都说他是“党人”，被杀被流放的官吏达六七百人。

三年后，宦官集团“宜将剩勇追穷寇”，又把株连扩大到太学生，一下子就抓了太学生一千多人。又过了几年，到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干脆直接下令“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只要和党人沾点儿边的，仕途就此终止。

至此，士人集团完全被打垮了。东汉政权成了无根之木，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轰然倒地。

很快，风来了。

二、黄巾风暴

说到东汉政权的解体，不能不提黄巾起义。黄巾起义爆发于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大规模农民起义。黄巾起义在爆发之前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起义的领导者张角借助宗教力量发动平民百姓。他派弟子分赴各地以传道为名发动和组织贫苦农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形成三十方，也就是三十个分支。其中，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

这个庞大的组织，主要依靠宗教信仰来维系。要谈黄巾起义，首先要谈谈黄巾军的宗教信仰——太平道。

太平道不是一种普通的宗教派别，而是一个异端教派。

很多人认为太平道就是根据道教经典《太平经》（又名《太平清领书》）而发展起来的教派。其实不然。《太平经》作为正统的黄老神学思想成果，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的改良主义思想。

东汉是一个神学非常发达的时代。早在西汉时期，由于受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儒家思想就逐渐开始神秘化，甚至有一些学派已经发展为神学理论。到西汉末年，各种图谶流行一时，更使得儒学越发具有神性。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也就是把各种图谶编纂成教科书，从而使谶纬之学正式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此后，为了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依议郎杨终的建议，仿照西汉石渠阁会议的办法，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阳白

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通过白虎观会议，儒家经义与谶纬图书等迷信东西进一步结合起来，儒家思想成为一种半神学思想。

儒家思想成为了半神学思想，一直与儒家分庭抗礼的道家黄老思想自然不甘落后。当时在高层颇为流行的黄老学说也逐渐神秘化起来。儒家的老大孔子不是圣人吗？道家的老大老子索性就变成了神，也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太上老君。于是就诞生了黄老神学。在汉代儒、道、法这三大政治思想已经逐渐融合。黄老神学的产生其实是儒家思想神学化的进一步发展。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汉桓帝在苦县的赖乡为老子立庙，而在庙里的墙壁上画有孔子的像。从这个例子中也可看出政府对于黄老神学的尊崇。

在皇帝的支持下，黄老神学当然具有无上权威，是官方正统的神学思想。《太平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太平经》最初是呈献给皇帝的。《后汉书·襄楷传》上说《太平经》本是宫崇敬献给汉顺帝的神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亦有兴国广嗣之术”。但是这书没有得到汉顺帝的欣赏。到襄楷手中，又再次向桓帝进献。到灵帝时，书中内容得到最高统治阶层的认可，灵帝“以楷书为然”。

从《太平经》的内容来看，基本上也是以劝人向善为主，劝富人多施舍一点给穷人，所谓“人贵人施”，其目的则在于“乐使王者安坐而长游”，即让统治者安心统治不必担心穷人造反。这就充分说明了，《太平经》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为解决社会问题以维护政府的统治而作的神学著作。

《太平经》传到张角手里，情况发生了变化。张角建立的太平道并没有把实现“太平”的希望寄托在皇帝、统治者的施舍和行善上面，而是要改天换地。黄巾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里明确地提出了要建立“黄天”。据《三国志·孙坚传》记载，张角“自称黄天太平”。“黄天太平”正是太平道的政治纲领和理想，与代表东汉的“苍天”相对立，具有强烈地推翻东汉统治的反抗精神。

所以《资治通鉴》里面说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妖术”二字，明确地将张角所创立的太平道列为异端、邪教。这与后来以五斗米教为代表的正统道教广泛流传并得到上流的社会认可和信奉完全不同。

这种不可能得到上流社会支持的异端邪教怎么能够广泛地传播开来？一方面是张角本人的个人魅力起了作用。当时瘟疫横行，普通老百姓有强烈的

求医需求。张角本人是一名出色的医生。《后汉书》说他治病“病者颇愈”。有了出色的医术作底子，加上适当的包装，不明真相的群众当然也就将他奉若神明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普通百姓生不得温饱，病无力医治，生活朝不保夕。他们痛恨东汉政府以及依附于政府的地方豪强，但又无计可施，只能求助于宗教迷信。太平道所宣传的平均思想、反政府的思想，迎合了这一社会心理，深得普通百姓的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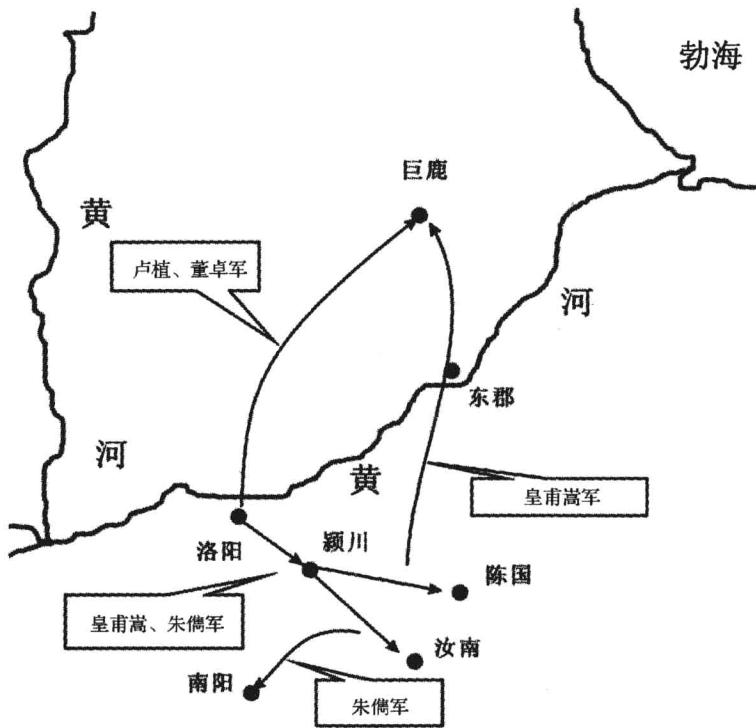
古往今来，任何政府都不会允许公开反对政府的极端教派大肆发展。太平道如此猖狂地发展，难道东汉政府就没有察觉吗？绝对不是。早在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太平道的发展就已经惊动了政府高层，时任太尉（相当于三军总司令）的杨赐就专门上书灵帝谈如何控制太平道。他指出：“张角等人屡教不改而且势力越来越大。如今如果下令各州郡抓捕讨伐，恐怕会更加麻烦，立即就会引发动乱。倒不如下令各地解散他们的组织，削弱他们的党羽，然后再将头目诛杀。这样就可以不劳而定。”到光和六年（公元183年）的时候，更多的地方官吏上报“张角支党不可胜计”。但是，由于东汉的统治者们正忙于内斗，这些建议和信息没有受到重视。

眼看就要到约定好的起义日——甲子年（公元184年）三月五日，出了一个变故。有个叫唐周的人向政府告密，将起义计划全部泄露。东汉政府吓了一跳，这才立即行动起来，逮捕了京师地区太平道的首领马元义，并在洛阳将他车裂，同时开始大肆捕杀太平道的信徒。

在这种情况下，张角“晨夜驰敕诸方”提前下达了起义的命令，黄巾大起义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史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遐迩摇荡，八州并发，烟炎绛天”，数十万农民同时拿起武器，反抗东汉朝廷。起义军所到之处，“燔烧官府，劫掠聚邑”，地方政府无力抵抗，“长吏多逃亡”。

面对黄巾起义的熊熊烈火，面对政权即将倒台的严峻局势，根据皇甫嵩的建议，东汉政府做了三件事。其一，解除党禁。当年三月，汉灵帝下诏“赦天下党人”。其二，强化地方武装力量。据《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当时为了对付黄巾军，命令各州郡加强军事力量，“诏敕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自函谷、大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诸关，并置都尉”。其三，组织军队平定起义。东汉政府紧急征募将士，诏令公卿提供战马、弩箭等武器装备，并征召官员后代和普通百姓中那些懂得军事的人。军队一组织好，汉灵帝立即任命皇甫嵩、朱儁为左、右中郎将，任命卢植为北中郎将，分别率军镇压颍川和

河北的黄巾军。



镇压黄巾起义路线图

东汉政府的这三个对策非常奏效。皇甫嵩、朱儁率领的中央军主力很快就打败了颍川黄巾军。在肃清周边的残敌之后，两人兵分两路。朱儁率军南下镇压南阳的黄巾军，皇甫嵩则率领另一部分中央军北上与卢植、董卓等一起“围剿”张角直接领导的河北黄巾军。到这一年的十一月，黄巾军主力基本上全部被镇压下去。黄巾起义失败。

这次大起义规模空前，但是它并没有像以前的陈胜、吴广起义摧毁秦帝国或者像赤眉、绿林起义摧毁新莽政权那样摧毁东汉政权，甚至没能支撑太久。原因何在？

第一，东汉政权的根基深厚。

前面讲过，东汉的国家机器一共三层。党锢之祸后，上两层已经面目全非，但是下层却没有变化。而且较之东汉初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豪强大